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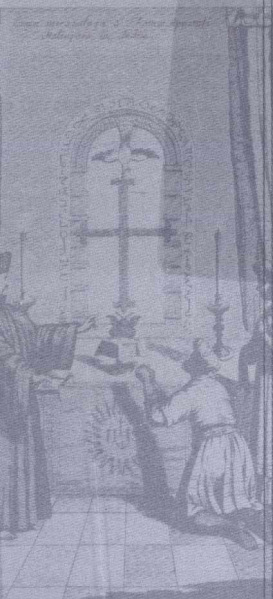
· 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 ·

中国图说

〔德〕阿塔纳修斯·基歇尔／著
〔中〕张西平 杨慧玲 孟宪谋／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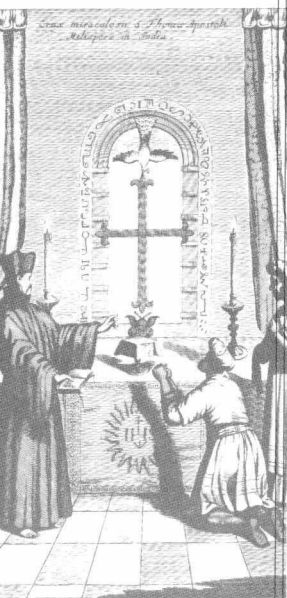


王 王 王 王 王
金 金 金 金 金
心 心 心 心 心
人 人 人 人 人



大象出版社

· 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 ·



中国图说

〔德〕阿塔纳修斯·基歇尔 著
〔中〕张西平 杨慧玲 孟宪谋 译

king zhi E 王
perfect zhen F 全
lin/ju G 姦
captured by love of someone (woman, thread, word)
sun ge K 月
moon yin I 月
brightness H 明
man G 人
afflicted H 人
gato
gem yu L
heart zhi B
M 玉
W 王
A 門
B 心
D 人

十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图说/(德)基歇尔著;张西平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3

ISBN 978-7-5347-5831-7

I. 中… II. ①基…②张… III. 中国—古代史—明清时代—通俗读物 IV. K248.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7259 号

Copyright 1987 Indian University Press

Bacone College, Muskogee, Oklahoma 74403

Lisa E. Johnson, Director of Publications

ISBN No. 0-940392-24-0

中国图说/[德]阿塔纳修斯·基歇尔/著

译者 张西平 杨慧玲 孟宪漠

校注 张西平

责任编辑 佳言

责任校对 石更新

封面设计 张帆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7.375

字数 433 千字

定价 39.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351

翻 译 手 记

在这里呈现给读者的《中国图说》翻译的底本是由 Charles Von Tuiy 翻译,1987 年在 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所组织的“东方系列”的第六卷,由 Denis Sinor 编辑出版的。但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还参考了基歇尔在 1667 年编辑出版的拉丁文版和 1670 年由 Françoise S. Dalquié^① 编辑出版的法文版。同时,我们还参考和引用了意大利汉学家马西尼关于卫匡国、中国学者关于大秦景教碑的研究成果。为了便于读者了解相关内容,行文中我们还做了大量的注释,以说明译文。这样,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个中译本就比较复杂,应该说是一个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译本。因此,有必要对译本做些必要的说明,以使读者清楚地知道中译本的特点和译本中各种文献的来源。

一、中译本和 1667 年拉丁文本的关系

1. 拉丁文本在“第一部分”前有一幅取自卫匡国《中国新图》

①对于本书法文版的翻译者我们所知甚少,具体情况可参阅 Federico Masini, *Notes on the first CHinese Dictionary Published in Europe* (1670), *Monumenta Serica* 51 (2003): 283-308.

一书的中国地图,英文版未收,中文版收录了这张图。

2. 1987年的英文版将拉丁文版中对大秦景教碑碑文的逐字对译翻译成了英文,考虑到这种翻译或与原文会有些出入,故中文版将1667年拉丁文版对碑文的逐字对译原稿影印后收入。

3. 为使读者了解西方对大秦景教碑认识的历史,中文版不仅将1987年的英文版中卜弥格对大秦景教碑的内容逐条解释成了中文,同时收入了拉丁文本中卜弥格的拉丁文译文的影印件。以便读者对照。

4. 英文版的插图顺序和拉丁文版的插图顺序有一些不同,而且有十余图的方向也放反了,但由于这些不同对理解图意并无大碍,故中文版基本上按照英文版制图排序。

5. 英文版未收入拉丁文版第140页、144页、197页、233页的四幅图,中文版这次补了这四幅图。

二、中译本和1670年法文本的关系

(一) 法文版刊出了基歇尔的一张画像,拉丁文、英文版都没有,中文版此次将这幅画像收入。

(二) 法文版收入以下内容,而拉丁文版、英文版均无。这是三者最重要的区别。

1. 法文版收入了托斯卡纳大公爵向来华传教士白乃心神父所提的关于中华帝国的各种问题以及白乃心的回答。

2. 法文版书后附有一部法汉词典,这是继1667年拉丁文版《中国图说》中收入的卜弥格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所做的注音后,在欧洲出版的第二部中文和欧洲语言对照的词典。这部汉法词典的作者是谁?它是如何被编入《中国图说》法文版的?对此学界有以下几种意见:

第一,卜弥格所写。波兰著名目录家 Estricher 在波兰都城出

版的插图本《宇宙大百科全书》之中,断定此书出于卜弥格之手。^①支持这个观点的还有波兰的波列斯瓦夫·什钦希尼亚克(Boleslaw Szczesniak)和当代波兰汉学家爱德华·卡伊丹斯基(Edward Kajdański)。^②

第二,利玛窦、郭居静(Lazare Cattaneo, 1560 - 1640)所写。这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观点,根据是在《中国图说》第二部分的第十章“耶稣会神父所惯用的使中国人改宗的方式”中,基歇尔列举了在中国的耶稣会神父们所写的中文书的书目,其中第12号书目的内容是“《中文字典》供耶稣会会员使用。此书我有一本,如果资金许可,我乐意为更多的人出版它”。^③伯希和认为:“如此看来,《中国图说》法文译本中所载无汉字的字典,说是利玛窦的这部字典,亦有其可能。”^④

第三,利玛窦、郭居静所写,由白乃心带回欧洲。这是当代意大利汉学家马西尼的观点,他认为:“当白乃心从中国返回欧洲后,首先把利玛窦的字典给了基歇尔,然后又给了法文版的翻译者。”^⑤这就是所谓的“白乃心假说”。

①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卷,第160页。其中《教理问答》在法文版的164~171页,一面为拉丁字写汉语,一面为法文译文。《汉法典》载入《中国图说》法文版的324~367页,亦用拉丁字写汉语。

②波列斯瓦夫·什钦希尼亚克认为“这是卜弥格的一部真正词典”。爱德华·卡伊丹斯基认为,“在这个版本中,基歇尔发表的中法词典,就是以普通形式出现的。但也可能由于技术问题,这部词典中去掉了汉字”。见爱德华·卡伊丹斯基著,张振辉译《中国的使臣卜弥格》,第234~235页,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

③参见基歇尔《中国图说》(英文版)第112页,基歇尔在这里所说的中文字典在柏应理所编的关于入华的耶稣会士在中国所写的中文书书目中也有记载,标题为“Vocabularium Ordine alphabetico Europaeo more concinnatum, et per accentus suos digestum”,参阅柏应理的 *Catalogus Paturm Societatis Jesu*, pp102 - 103.

④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卷,第233页。

⑤Federico Masini, *Notes on the first Chinese Dictionary Published in Europe (1670)*, *Monumenta Serica* 51 (2003): 283 - 308.

这部法汉词典是中西语言交流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如果弄清这个文献的由来,对传教士们在中国语言学上的研究会更進一步,对研究中国语言学史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至今,我们仍不能确定在《中国图说》的法文版中所发表的《汉法词典》的作者和利玛窦所编的字典的最后下落。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感谢《中国图说》法文版翻译者,正是他发表了这样重要的词典。为了让中国的读者对这部词典有更多的了解,在中文版中,我们收录了整理后的法文版中的法汉词典的原本。

三、《中国图说》中译本和中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关系

本书中译本的翻译是建立在中外学术界大量研究的基础上的,比如对大秦景教碑的介绍在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在翻译时,借鉴并吸收朱谦之和翁绍军先生的研究成果。《中国图说》中对中国的介绍主要来自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利玛窦的《中国札记》,卫匡国的《中国新图》、《中国上古史》以及汤若望、白乃心、卜弥格等多名传教士关于中国的著作或通信。所以我们在翻译中参考了有关这些传教士的一些中外译本,其中关于卫匡国的史料大都是由马西尼教授提供,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09年8月15日

神奇的东方

——中译者序

对 17 世纪的欧洲人来说,遥远的东方是一个神奇的梦。自 15 世纪始,不断有欧洲人踏上这块陌生的大陆,一本本游记、一封封书信,像一阵阵清风吹进欧洲中世纪的城堡。异国的风情,悠久的历史,美丽的传说,富饶的物质生活,所有这些都令欧洲人怦然心动。于是了解中国、了解东方成为社会的时尚。在这期间德国耶稣会学者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的《中国图说》,是当时推动欧洲“中国热”的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是欧洲 17 世纪著名的学者、耶稣会士,于 1602 年 5 月 2 日出生在德国的富尔达,1618 年他十六岁时加入了耶稣会,之后在德国维尔茨堡任数学和哲学教授。他兴趣广泛,知识广博,仅用拉丁文撰写的著作就有四十多部,被称为“自然科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机械学家、哲学家、建筑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东方学家、音乐学家、作曲家、诗人”,^①和“最后的一个文艺复兴

^①G. J. Rasenkranz: *Aus dem leben des Jesuite 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 p. 13

人物”。^①

基歇尔是来华耶稣会士卫匡国的数学老师,与许多到东方传教的传教士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卜弥格、白乃心等。白乃心从欧洲来中国以前,曾和基歇尔商定,将随时把在东方旅途的见闻告诉他。曾德昭、卫匡国、卜弥格从中国返欧时都曾和他见过面,提供给他许多有关中国和亚洲的第一手材料。

基歇尔正是在掌握了这些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凭借着自己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想象,写出了《中国图说》。这本书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分别从字音、字义、解读三个方面全面介绍了大秦景教流行碑;第二部分介绍的是传教士在中国各地的旅行,从马可·波罗到白乃心、吴尔铎的西藏之行,将中国、中亚、南亚的许多风俗人情、宗教信仰做了详细描绘;第三部分是关于中国及亚洲各地的宗教信仰,向欧洲的读者介绍了中国的儒、释、道三种教派;第四部分是传教士们在中国各地所见到的各种人文与自然的奇异事物,包括中国的山川、河流、植物、动物等;第五部分向人们展示中国的庙宇、桥梁、城墙等建筑物;第六部分介绍中国的文字,首次向西方人展示了中国文字的各种类型。《中国图说》的拉丁文本 1667 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②原书名为“China Monumentis qua Sacris qua profanis, Nec non variis Naturae & Artis Spectaculis, Aliarumque rerum memorabilium Argumentis illustrata.”即《中国的宗教、世俗和各种自然、技术奇观及其有价值的实物材料汇编》,简称《中国图说》,即“China illustrata”。

^①参阅《简明不列颠大百科全书》,第 4 卷,第 173—174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 年版。

^②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是国内较早介绍研究《中国图说》的著作,但他将该书第一版出版时间说成 1664 年有误。

《中国图说》的拉丁文版刊发后在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第二年就出版了荷兰文版,1670年又出版了法文版。它的内容被许多书籍广泛采用。^①这本书不仅被当时的欧洲学者所看重(如莱布尼茨案头就有这本书,并对他的东方观产生了影响),同时它又为一般读者所喜爱。由于这本书中的插图精美而且数量众多,以至于欧洲许多图书馆中收藏的《中国图说》的插图会被读者撕走。法国学者艾田蒲将此书命名为“耶稣会士阿塔纳修斯·基歇尔之中国——附多种神圣与世俗古迹的插图”,并认为“尽管编撰者是一个从未去过亚洲的神父,但此书的影响比金尼阁的《游记》影响还要大”。^②《中国图说》1986年英文版的译者查尔斯·范图尔称,在“该书出版后的二百多年内,在形成西方人对中国及其邻国的认识上,基歇尔的《中国图说》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著作”。^③

考察西方早期汉学史,基歇尔的这本书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它是西方早期汉学发展史链条上一个重要的环节。

一、《中国图说》对大秦景教流行碑的介绍

来华耶稣会士中最早向西方报道《大秦景教流行碑》的是来自意大利的罗雅谷,^④而后还有金尼阁、阳玛诺等人,来自葡萄牙的曾德昭在他的《大中国志》一书中也曾较早地向欧洲报道过《大秦景教流行碑》。虽然罗雅谷、曾德昭等人对《大秦景教流行碑》

①参阅 Nieuhof, Jan. *An Embassy from The East 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to the Grand Tartar cham Emperour of China; delivere, by their excellcies, Peter de Goyer, and Jacob de keyzer, at his imperial of Peking*, London 1673.

②艾田蒲《欧洲之中国》,第26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上册。

③《中国图说》1986年英文版,序言

④参阅(英)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1页,朱谦之《中国景教》,第90—93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的介绍早于基歇尔的《中国图说》，但从对欧洲的影响来看，后者的影响远远超过前者。据介绍，从17世纪到20世纪三百年来外国学者对西安大秦景教流行碑的研究著作有四十多部，从出版的时间上来看基歇尔的《中国图说》排在第十一位，但在以后的时间里，受到基歇尔译文影响的研究者，无论是批评他、赞成他还是重复他的有九人之多。如安德烈·米勒在他的书的第一部分“列举了卜弥格的拉丁文译本对音转写，并附有祈尔歇（即基歇尔，下同）的‘编译文’”；雷诺多在他的书中“纠正了基歇尔和米勒对碑文的某些诠释”；叙利亚的约瑟夫·西蒙·阿斯马尼指责基歇尔将“Hananiso”考证为亚历山大城的科普特人主教，而“此人事实上仅是景教徒们的一名迦勒底人主教”；方济各会夏尔·德·卡斯托拉诺神父在其手稿中“不但重复了基歇尔和卜弥格的全部错误，而且还增加许多新的误解……”；第一个俄译本的学者斯帕斯基在将大秦景教流行碑文翻译成俄文时“只参照了基歇尔的《中国图志》一书”；19世纪在中国颇有影响的裨治文的译文是“根据基歇尔的《中国图志》那错误百出的图版而译制的”；而世界一流学者伟烈亚力在研究西安大秦景教流行碑时，“对于其中的古叙利亚文，他仅满足于利用祈尔歇的陈旧的释读”；法国学者鲍狄埃对于古叙利亚文的碑文“只是抄袭了基歇尔和阿斯玛尼等人的译文”；法国传教士达伯理1877年的译文“只根据基歇尔有关该碑是天主教碑文的说法，认为入华耶稣会士们都一致同意基歇尔的观点”。这些足以证明基歇尔《中国图说》中对西安大秦景教流行碑文解释的影响。^①

尽管基歇尔对大秦景教流行碑的研究错误很多，但仍有其不可抹杀的学术价值，这表现在以下三点：

^①参阅耿昇《外国学者对于西安府大秦景教流行碑的研究》一文，见《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1期；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首先,他根据第一手材料,报道了该碑文的发现过程。对于在西安府发现大秦景教流行碑的报道早于《中国图说》的有1625年罗雅谷的拉丁文译稿,但此译文并未公开发表,只是手稿。有1629年邓玉函对碑文中的叙利亚文做的翻译,但只是翻译了部分内容。1631年的法译本,也“仅译了四分之一”^①。1631年基歇尔在他的《有关古代宗教碑文的诠释》(*Prodromus coptus*)一书中首次翻译并出版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全文,它根据葡文本转译成了意大利文本。^②后来,基歇尔又根据曾德昭的报道以及这个意大利文译本和新的材料,尤其是卜弥格所提供的材料将其整合后译成了拉丁文本,在《中国图说》中发表。另外几个译本如1652年金尼阁的拉丁译本,1652年何大华的译本,影响都不及基歇尔的《中国图说》。在《中国图说》中,由于作者使用了当时最新的一手材料,从而加大了欧洲学术界、宗教界对这一碑文发现过程的了解。在书中基歇尔把曾德昭《大中国志》中关于大秦景教流行碑的报道做了详细的摘录,并说曾德昭把“一个完全的拓印本送给了我”。^③这说明曾德昭到罗马时已将拓本带给了他。他还说卫匡国回到罗马时也曾当面“向我解释碑文”,他在书中也详细摘录了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的部分内容。同时基歇尔还在书中全文登载了卜弥格关于大秦景教流行碑的通信。卜弥格明确地说,他是该碑文的“目睹者”,他手中有关于“碑文的最准确的复印件”^④。此前没有任何人像基歇尔这样对此事进行如此充分地报道,并且提供大量的事实。正是在基歇尔《中国图说》的推动下,西安大秦

①朱谦之《中国景教》,第91页。

②“自从我在我的 *Prodromus coptus* 中对公元1625年中国发现的中国—叙利亚碑作出解释后,大约三十年了。”见《中国图说》英文版,第1页。

③《中国图说》英文版,第6页;参阅曾德昭的《大中国志》,第190—1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④基歇尔《中国图说》英文版,第8页。

景教流行碑在西方一直有着广泛的影响,从而推动和影响了当时耶稣会在华的传教事业。

其次,基歇尔首次刊出了卜弥格对碑文的注音和翻译。基歇尔对碑文的介绍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对碑文逐字进行拉丁字母注音;第二部分对碑文作逐字的解释;第三部分是对碑文作了系统的翻译。尽管前两部分是卜弥格做的,但基歇尔首次在《中国图说》中刊出卜弥格的注音和译文,这对中西双方都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这个注音,西方人可以了解中文的发音,从而加深他们对中文的认识。自耶稣会入华以来传教士们寄回欧洲的大量书信中不断地有对中国语言文字的介绍,其中也初步介绍了中文的发音的特点,但像卜弥格这样系统地、大规模地对中文进行拉丁文注音这是首次。对于中国来说,这个注音对照表是汉语走向拉丁字母拼音化的重要文献,长期以来我们研究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是利玛窦在《程氏墨苑》和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中的注音,材料十分有限。罗明坚虽已写了《葡汉词典》,毕竟只是手稿,尚未公开出版,而《中国图说》在17世纪就已正式出版,因而它在学术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基歇尔将卜弥格的碑文注音系统全部发表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如罗常培先生在评价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时所说的:“用罗马字母分析汉字的音素,使向来被人看成繁杂的反切,变成简易的东西。”^①此外,基歇尔还确定了碑文的具体时间。大秦景教流行碑上关于立碑的时间有两个:中文的碑文说石碑是“大唐建中二年岁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即公元782年2月4日。而叙利亚文的碑文显示的是“希腊历1092年”。^②为什么是两个

^①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年第一本,第三分册,第268页。

^②均见朱谦之《中国景教》,第87、139页。

时间呢？基歇尔经过考证认为“可从亚历山大历的 1072 年（这可在叙利亚文的碑文中见到）减去 310 年（这是基督教历与亚历山大历的差数），剩下的是 782 年，这个基督教纪年是在碑文的中文中，这同叙利亚—希腊或亚历山大历的纪年是完全相合的”。^①

二、在 17 世纪首次向西方报道了西藏的情况

西方对西藏的关注由来已久，柏朗嘉宾在他的《蒙古史》一书中已涉及到“波黎吐蕃”（bunutabeth），即藏族的情况，^②鲁布鲁克也曾提到了西藏盛产黄金。^③

意大利的传教士鄂多立克是较早深入西藏的西方人，方豪先生认为他“奉命回欧洲号召其他教士东来，并为探寻新路，乃由陕西、四川而入中亚，经波斯、亚美尼亚，回抵意大利……四川以后的一段路程，据游记的考证家，多认为和氏（即鄂多立克——作者注）曾取道西藏，目为第一个到西藏的欧洲人……”^④

16 世纪以后到达西藏并向西方作报道的有耶稣会的传教士安东尼奥·德·安夺德神父。^⑤安夺德神父主要在西藏的阿里西南部的扎布让，这是当时古格王国的首都。但是第一个到达拉萨，并探索一条从北京经西藏通往欧洲路线的是奥地利来华传教士白乃心，他被称为“最早赴拉萨的欧洲人”^⑥。《中国图说》是首次报道白乃心西藏之行的图书，这是《中国图说》在欧洲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同上，第 39 页。有一点应注意，“唐建中二年”实应是公元 781 年，基歇尔所有对中国的纪年都算多一年，这样成了公元 782 年。

②泰勒著、耿昇译《发现西藏》，第 6—7 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 年出版。

③参阅《柏朗嘉宾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第 50—51 页，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④《方豪六十他定稿》上册，第 88 页，台湾云天出版社，1970 年版。

⑤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四章。

⑥泰勒著，耿昇译《发现西藏》，第 37 页。

1623年荷兰人袭击澳门并封锁了果阿,到1661年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已封锁了所有通往中国的港口,耶稣会来华的海上路线完全被切断了。罗马教廷和耶稣会决心寻求一条新的从中国到达欧洲的路线。此时在北京的汤若望已得知,顺治十年(1652)西藏的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曾来京,并受到顺治的接见和清王朝的正式册封,于是汤若望认为若取道西藏返回欧洲肯定会得到清廷和西藏当局的保护。于是他挑选了在北京天象台工作的白乃心和吴尔铎,希望他们经由西藏返回欧洲,开辟一条欧洲与中国之间的新路线,打破荷兰人的封锁。

由于白乃心离开欧洲以前曾答应将在东方旅行的材料寄给基歇尔,这样基歇尔在出版《中国图说》时就运用了白乃心带来的材料。

基歇尔在书中公布了白乃心、吴尔铎从北京到拉萨再到南亚孟加拉的旅行路线。这条路线途经北京—西宁—卡尔梅沙漠—拉萨—兰古尔山峰—尼泊尔的库蒂—尼泊尔的那斯蒂—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尼泊尔的帕坦—马兰加王国—莫卧儿的第一个城市穆特加利—孟加拉国巴塔那—恒河边的贝拿勒斯—阿格拉(Agra)等地。

基歇尔还介绍了西藏的政治宗教情况,认为西藏是政教合一的王国。他谈到喇嘛的转世和继承问题。最后,他将白乃心绘制的西藏图画收入《中国图说》。白乃心擅长绘画,在北京—西藏—欧洲的整个旅途中他绘了不少图画,其中有几幅是关于西藏的。这是西方人第一次通过图画看到西藏的宗教、社会和建筑的情况,因此当白乃心的这些图在《中国图说》上发表时,在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但是白乃心在西藏停留的时间毕竟很短,不可能对西藏有很深的了解,他这种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介绍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错误。例如他说当时西藏有两个国王,一个叫德瓦,另一个则不

问政务。有些学者认为“在此白乃心记述不甚确切。他说的后者，当时无疑指的是第五辈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前者应是蒙古汗王，但他却不是第五辈达赖喇嘛的兄弟。1656年固始汗（即顾实汗）死后，其长子达延汗（有的写作达颜汗）与第七子札什巴都尔在青海争夺汗位继承权。1658年，他们分割和顾特部统治权，札什巴都尔管青海，达延汗到拉萨继承汗位。白乃心抵拉萨正是1661年10月，因此，此时在拉萨掌管世俗大权的是达延汗”^①。

另外，白乃心所绘的有关西藏的几幅画中也存在一些错误。有一幅图画的是两人人向达赖喇嘛朝拜，画中的达赖喇嘛的服装与实际出入很大。“这幅画纯属白乃心想象画出来的，因为白乃心没亲眼见过第五辈达赖喇嘛。他在拉萨时曾提出要谒见达赖喇嘛，但第五辈达赖喇嘛不同意接见，因为他不见异教徒”。^②

关于布达拉宫的画也与实际不符，“很多人认为，这幅画的内容，不完全是当时看到的情景，而增加了画家一些想象成分，如那辆两轮车，在拉萨是不可能存在的”。^③

基歇尔将白乃心关于西藏的报道和绘画收入《中国图说》中，尽管有很多常识性的错误，但毕竟在17世纪第一次向西方人介绍了西藏，将西方人对中国的版图视野扩展到了西藏，并“引起了西藏的强烈兴趣”。^④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图说》关于西藏的介绍在西方早期汉学史中有着独特的地位。

三、对中国语言文字的介绍

自罗明坚以来，欧洲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早期汉学著作，都要涉及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基歇尔的《中国图说》也不例外。基歇尔关于中国文字和语言的知识很有限，大部分材料来自入华传教士

①②③ 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第337、338页。

④ 泰勒著，耿昇译《发现西藏》，第40页。

的书信,其中卜弥格所提供的材料较为重要。卜弥格在 1653 至 1656 年在罗马期间曾经教授基歇尔中文。但卜弥格本人并没有写过关于中国语言方面的著作,对中国语言缺少深入的研究。虽然在他返回欧洲时身边带了一位姓沈的中国人(Chen An-te-Lo)^①,他也许会为基歇尔提供一些材料,但这都很有限,因为基歇尔本人不会中文。

基歇尔的中国语言观仍是 17 世纪的基督教的语言观,在这方面他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只是更加系统些而已。他认为大洪水以后诺亚的子孙们统治着世界,并把其帝国扩展到东方,“中国是最后一个被殖民化的国家”。因而他说,“中国文字的第一个发明人是伏羲皇帝,我毫不怀疑伏羲是从诺亚的后代那里学会的”。基歇尔这一观点的根据就是中国文字和埃及文字一样都是象形文字,“古老的中国文字对此是最有力的证明,因为它们完全模仿象形字的写法”。在他看来,中国人是根据事物本身来造字的,他们和埃及人一样,从兽类、鸟类、爬行类、鱼类、植物等多种事物的图形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字。由于天下事物林林总总,不计其数,因而中国的文字也特别多。他说在中国一个有学问的人至少要认识八万字,因而一个人若想获得更多的知识,他必须不断学习认字,而且还要有很好的记忆力。一个人只有“用他们的巨大劳动才能成为真正有学问的人,最终达到最高的博学程度,从而被选拔到帝国政府机关的最高层中”。

对中国古文字的介绍是基歇尔中国语言观中最有特色的部分,也是整个《中国图说》最有光彩和当时最吸引人的部分。他认为在中国古代共有十六种文字类型,它们分别是:龙书、农书、鸟书、虫书、根书、鸟翼书、龟书、孔雀书、草书、牌匾书、星书、敕令书、

^① 孟德卫《神奇的土地》英文版,第 144 页;伯希和《卜弥格传补正》,见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